

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及其政治效应^{*}

曾向红 杨 恕

【内容提要】 美国学术界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是美国介入中亚事务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美国中亚研究中对美国中亚政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危险话语”。“危险话语”通过片面或扭曲呈现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风险,建构了一种中亚地区危险重重、随时可能爆发各种危机的意象。其中,“危险话语”尤其体现在美国中亚学术界关于中亚国家在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和大国尤其是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影响这两个议题的研究过程中。尽管“危险话语”建构的中亚意象往往不符合该地区的发展现状,但它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效应,不仅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决策者与大众等关于中亚地区的认知,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推动了美国中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美国基于“危险话语”制定的中亚政策虽然具备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但其带来的后果却不一定全是积极的,有可能导致难以顺利推进其在该地区追求的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战略目标。

【关键词】 美国中亚研究;美国中亚政策;美国外交;话语分析;“危险话语”

【作者简介】 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兰州 邮编:730000)

【中图分类号】 D815 H0-06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4)01-0093-21

^{*} 本文系笔者在计划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暂定名)一书第五章第三节的基础上大幅修改而成。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批准号:06JZD0012)与兰州大学重点研究基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批准号:13LZUJBWTD012)的资助。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文章的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美国在苏联解体后积极介入中亚事务,现已成为中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外部行为体。在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始终在为其追求能源、安全与民主等方面的政策目标寻找相应的理由,以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说明美国参与中亚地区事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美国学术界对中亚问题的研究,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这种理由。尽管美国中亚研究与美国中亚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活动领域,但前者对后者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对美国中亚政策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本文致力于考察以下三个问题:美国中亚研究为什么“危险话语”盛行?这种话语针对中亚地区构建了什么样的意象?这些意象对美国的中亚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 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及研究现状

美国学术界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是美国介入中亚事务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在研究中亚问题的过程中,经常出访中亚各国、访问相关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采访相关人员、参与或召集学术会议,并深入到各国进行社会调查。这些活动不仅是美国在中亚地区拓展自己影响力的方式,而且经由美国中亚研究者的研究生产出大量介绍、认识、解释该地区事务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进而对美国决策者、国际学术界和普通大众了解中亚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话语分析有关话语具有“(再)生产出关于社会世界的意义体系,以相应的方式组织客体和主体”的功能可知,^①美国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是美国研究者生产和再生产关于中亚地区意义体系的话语,它们以一定方式组织了美国这一主体与中亚各国这一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于,美国的中亚研究者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这种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截至目前,国内外开展这种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唯一的例外是国外学术界自21世纪以来进行的关于中亚“危险话语(discourse of danger)”的一些研究。事实上,“危险话语”构成美国中亚研究中的一种主导性话语。除此之外,美国中亚研究中至少存在其他三种主导话语,如转型话语、大国竞争话语与援助话语等。不过,“危险话语”对美国中亚政策的影响最为直接,其政治效应最为明显,本文将集中研究“危险话语”对美国中亚政策的影响。

所谓美国学术界关于中亚地区的“危险话语”,是指由于美国的研究者对中亚地区的复杂形势缺乏足够的了解或为达到某种目的,从而片面或扭曲呈现中亚国家在政

^① Elisa Wynne-Hughes, “‘Who Would Go to Egypt?’—How Tourism Accounts for ‘Terror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3, 2012, p. 617.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风险,进而建构了一种中亚地区危险重重、随时可能爆发各种危机这种意象的话语。例如,在美国的中亚研究中,许多成果经常预言中亚国家会发生边界冲突、中亚国家之间会因争夺跨国水资源爆发水战、费尔干纳盆地会发生大规模的族群冲突、激进伊斯兰浪潮会席卷中亚、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的逝世会导致土库曼斯坦的动荡、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即将崩溃等。然而,这些预言至今一个也没有实现。做出这些预言的研究成果虽然注意到中亚国家内部及相互关系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但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形成根源、表现形式、发展动力等做了错误的判断,以至这些判断至今尚未得到验证。在针对中亚地区建构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意象的基础上,“危险话语”赋予美国积极介入中亚事务,以将各国从危险中“拯救”出来的角色。

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之所以盛行,与美国中亚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密切相关。整体而言,1991年以来的美国中亚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也面临一些缺陷,^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脱节、研究范式相对狭隘、研究方法单一。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美国有关中亚研究的问题具有浓厚的政策相关性,许多研究成果是政策驱动的,很少关注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争论,也无意用理论指导自身的研究。由此导致美国的中亚研究主要由政策或实践取向的成果所主导,理论研究的成果较少而且影响不大。而那些尝试将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研究结合起来的成果,则面临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研究范式相对狭隘。中亚各国独立后,美国的中亚学界主要通过“转型范式”或“转型学”来研究中亚问题。基于这些范式对中亚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往往用线性发展观裁剪中亚国家的发展过程,忽视中亚地区发展的特殊性与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从而出现了对中亚发展形势的误读和曲解。^②美国中亚研究第三个方面的缺陷在于研究方法的单一。笔者整理了1996-2011年间美国高校授予的关于中亚问题的259篇博士学位论文目录,^③其中不少博士论文采用了比较案

① 对于美国中亚研究状况的整体评估,参见 Amanda E. Wooden, Medina Aitieva and Tim Epkenhans, “Revealing Order in the Chaos: Field Experiences and Methodologie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on Central Eurasia,” in Amanda E. Wooden and Christoph H. Stefes, eds.,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Enduring Legacies and Emerging Challeng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 30-71; Leonard A. Stone, “Research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4, No. 4, 2005, pp. 441-451; Leonard A. Stone, “Central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Vol. 29, No. 1, 2012, pp. 175-202.

② William Miller, Stephen White and Paul Heywood, *Value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p. 62.

③ 相关论文经由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检索平台与《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每年第四期上对关于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博士学位论文目录的统计所得。对这些博士论文目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与笔者联系。

例分析、文本解读、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过程追踪等定性研究方法以及形式模型、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相较之下,美国中亚学术界公开发表的大多数成果,尤其是政策研究报告,主要是描述性或预测性内容。这些成果虽然不乏洞见,但学理化水平有待提高。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中亚博士论文没有公开出版,而且较少受到关注,所以影响较小。美国中亚研究上述三个方面的缺陷,直接影响到美国中亚学界对中亚地区形势的判断,导致美国中亚研究中“危险话语”盛行。

针对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国外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例如,中亚研究领域的知名刊物《中亚调查》(Central Asia Survey)在2005年第1期以“中亚的危险话语”为主题,刊发了五篇分析并批判西方关于中亚“危险话语”的文章。^①该期特刊运用多种视角对西方“危险话语”产生的根源、活动领域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剖析,从而为关于中亚“危险话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自那以后,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亚问题的过程中较为普遍地使用了“危险话语”这一术语,而且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②突出代表是约翰·希瑟肖(John Heathershaw)与尼克·梅戈伦(Nick Megoran)发表在2011年第3期《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杂志上的《争辩危险:中亚政策与学界的新议程》(下称《争辩危险》)一文。^③该文不仅使用了“危险话语”的概念,而且还对“危险话语”三个方面的特征做了深入分析。总体而言,关于中亚“危险话语”的研究,已成为西方中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④

不过,国外关于“危险话语”的研究本身仍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西方学术界对中亚研究中“危险话语”的批判,没有与对美国中亚研究状

① 这五篇文章是:S.Neil Macfarlane and Stina Torjesen, “‘A Wash with Weapons’: The Case of Small Arms in Kyrgyzstan,” *Central Asia Survey*, Vol. 24, No. 1, 2005, pp. 5-19; John Heathershaw, “The Paradox of Peacebuilding: Peril, Promise, and Small Arms in Tajikistan,” *Central Asia Survey*, Vol. 24, No. 1, 2005, pp. 21-38; Nicole J. Jackson, “The Trafficking of Narcotics, Arms and Humans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Mis)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Realities,” *Central Asia Survey*, Vol. 24, No. 1, 2005, pp. 39-52; Christine Bichsel, “In Search of Harmony: Repairing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Ferghana Valley,” *Central Asia Survey*, Vol. 24, No. 1, 2005, pp. 53-66; Madeleine Reeves, “Locating Danger: Konfliktologiia and the Search for Fixity in the Ferghana Valley Borderlands,” *Central Asia Survey*, Vol. 24, No. 1, 2005, pp. 67-81。

② 这些成果可参见 Madeleine Reeves, *Border-Work: An Ethnography of the State at Its Limits in the Ferghana Valley*, Ph. 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7; Christine Bichsel,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John Heathershaw, *Post-Conflict Tajikistan: The Politics of Peacebuild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Legitimate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③ 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 “Contesting Danger: 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3, 2011, pp. 589-612。

④ 鉴于“危险话语”已得到国外学界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本文沿用了这一概念,但在使用过程打上双引号以示谨慎,希望国内学界就该概念是否确切等问题展开讨论。

况的考察联系起来。^① 缺乏这种考察,导致不能明确“危险话语”在美国中亚研究成果中的整体分布状况,从而在批判“危险话语”的同时再生产出新的“危险话语”。其次,现有研究并未明确“危险话语”与美国中亚政策之间的关系,没有探讨前者影响后者的具体机制。再次,现有成果未能明确“危险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例如,《中亚调查》2005年第1期特刊曾指出,话语与美国所具有的权力优势存在联系,但它并未明确这种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类型以及这种权力带来了什么样的政治后果。^② 因此,有必要借鉴相关理论来澄清“危险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现有关于中亚“危险话语”的成果,较多地围绕具体案例及其特征而展开,并未对“危险话语”的表现形式及其政治效应进行集中讨论。如《中亚调查》特刊刊发的五篇文章,研究的主要是“危险话语”在中亚各国具体案例中的作用,而没有对“危险话语”建构的关于中亚地区的整体意象进行集中研究。然而,这样的整体意象在美国学术界、决策层与公众了解和把握该地区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争辩危险》一文虽力图研究“危险话语”关于中亚地区的整体意象,但其主旨在于概括“危险话语”的特征,它无意也没有集中讨论“危险话语”的表现形式及其政治效应。因此,本文将集中研究“危险话语”建构的关于中亚地区的整体意象及其对美国中亚政策产生的影响。

二 批判话语分析视角下的“危险话语”

本文对美国中亚研究中“危险话语”及其政治效应的研究,将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尽管目前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美国中亚研究状况进行讨论的成果并不多,但这种研究路径能带来不少启示。批判性话语分析认为,话语都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是意识形态的一种物质形式,而且是一种渗透了意识形态的语言”。^③ 因此,批判性话语分析关心的是“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社会权力、控制与不平等通过文本和言谈(talk)得以形成、生产和被抵制的方式”。^④

① 如《中亚调查》特刊指出:“‘危险’是当前在讨论中亚各国政治、社会及其前景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议题,无论讨论者考虑的是开展非政府组织项目、促进政治发展还是进行学术研究”,但该期特刊并未对“危险话语”在美国中亚研究成果中的状况进行讨论。《争辩危险》及其他相关成果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引文参见 Chad D. Thompson and John Heathershaw, “Introduction,” *Central Asia Survey*, Vol. 24, No. 1, 2005, p. 1。

② 相关论述可参见 Christine Bichsel, “In Search of Harmony: Repairing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Ferghana Valley,” p. 53, p. 61, p. 63。

③ Norma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1995, p. 73。

④ Teun A. van Dijk,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SAGE, 1998, p. 1。

体现意识形态和作为意义体系的话语,是“通过群体成员社会性地获得、共享、使用和改变的,因此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共享心智呈现(socially shared mental representation)”^①。作为“特殊类型的社会共享心智呈现”,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而且还以特殊方式建构了美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被“危险话语”赋予一种拯救者的角色,而另一种主导话语——转型话语则将美国建构为中亚国家的效仿对象和发展的典范。

话语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形式话语(formal discourse)、实践话语(practical discourse)与大众话语(popular discourse)^②。形式话语主要是指国际问题专家、战略思想家、知识分子撰写的学术论著,包括专著、学术期刊论文、政策咨询报告等。实践话语主要包括政府决策人员、官方机构以及外交政策思想库表达的话语。大众话语是指在大众媒体如网络、电视、小说、电影等媒体上流传和传播的话语。在批判性话语分析者看来,各种类型的话语“通过社会成员的日常使用——包括一般性的实践尤其是话语实践——实现再生产”^③。因此,对于政治话语的研究,“只有在阐明了社会-认知中介后才能得到充分的描述和解释,而社会-认知中介与控制政治行动、过程与系统的社会共享的政治呈现(political representation)密切相关”^④。而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因为与美国民众对中亚地区的认知及美国中亚政策密切相关,无疑属于一种典型的社会-认知中介。由于笔者主要关注中亚地区在美国中亚学术研究成果中呈现出的状况,因此本文主要的话语研究对象为形式话语,对实践话语和大众话语只是简单涉及。

美国中亚研究的“危险话语”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权力关系中产生的,它们运用西方提出的理论范式和学术假定,建构并再生了各种关于中亚地区的意象。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针对中亚国家行使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力。这种权力并非国际关系学者通常所说的“硬权力”或“软权力”,而是一种呈现性权力(representation power)。呈现性权力是一种通过生产出关于客体的影像、意义、规范、价值、知识等话语,使主体得以

① Teun A. van Dijk,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p. 126.

② 这里笔者借鉴了著名批判地缘政治学家杰拉德·奥特瓦赛尔(Gearóid ó Tuathail)等人关于地缘政治话语的分类,即分为形式推理(formal reasoning)、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与大众推理(popular reasoning)三种类型。参见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56.

③ Teun A. van Dijk,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p. 126.

④ Teun A. van Dijk,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Cognition,” in Paul Chilton and Christina Schäffner, eds., *Politics as Text and Talk: Analytical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p. 234.

影响并改造客体的心智、习惯、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力量。^① 呈现性权力必须通过话语才能发挥作用。当呈现性权力在使用话语的过程中失去了客观性,并以误解、扭曲或肤浅的内容表现出来的时候,“危险话语”就成为这一过程的产物。不过,仅仅对客体进行片面和扭曲的呈现是不够的。只有在针对客体建构的扭曲意象得到后者的认可和接受,并使其自觉地改变思维方式、习惯与世界观时,呈现性权力才实现了其预定目的。正因如此,呈现性权力发挥作用的过程较为缓慢,但一旦实现,将产生持久的影响。在呈现性权力运作的过程中,话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而且是最主要的媒介。

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是美国针对中亚国家行使呈现性权力的重要渠道。“危险话语”对于中亚国家进行的错误与片面呈现,仅仅是呈现性权力发挥作用的第一个阶段,但这一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为美国的中亚政策提供了论证和具体的政策建议,而且还影响到中亚国家决策者和大众对自身的认知。随着“危险话语”的广泛传播以至成为“客观知识”或常识,中亚国家的决策者和公众也会内化“危险话语”建构的中亚意象,并为消除和改善这种负面意象自觉地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甚至行为方式。尽管“危险话语”无法保障一定能实现呈现性权力所追求的目标,但它毕竟构成呈现性权力发挥作用的必经阶段。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与美国针对该地区行使的呈现性权力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至于呈现性权力的运作领域和表现形式,除了作为形式话语的美国中亚研究成果,还包括美国致力于向中亚各国灌输的各种价值观、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在援助中亚国家过程中设置的援助条件等。也就是说,本文研究的美国中亚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只是美国针对中亚地区实施呈现性权力的一个领域。

需要明确,不是美国中亚研究中的所有话语都能产生影响,或者都是美国针对中亚国家行使呈现性权力的体现。某些话语因为与主流话语有别,往往被忽视和排斥,甚至可能永远得不到决策者的关注。例如那些批判美国中亚研究中“危险话语”的研究成果,很可能就会遭此命运。^② 另外,由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毕竟是两个不

① 尽管不一定使用“呈现性权力”的概念,但涉及“呈现性权力”概念运作机制的相关成果,可参见 Roxanne Lynn Doty, *Imperial Encounters, Imperial Encounters,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Minnesota: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6; Janice Bially Mattern, “Why ‘Soft Power’ Isn’t So Soft: Representational Force and Attr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 Felix Bereskoetter and Michael J. Williams, eds.,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90-119; Janice Bially Mattern, *Orde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dentity, Crisis, and Representation For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Janice Bially Mattern, “The Power Politics of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3, 2001, pp. 349-397; 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尤见第五章。

② 包括《中亚调查》2005 年专刊上批判“危险话语”的研究成果,由于发表在专业期刊上,而且尝试描绘一幅关于中亚地区的复杂和客观意象,因此除了一些研究者对这些成果有所注意外,它们对美国关于中亚实践话语、大众话语的影响是很小的。

同的活动领域,因此,即使是美国中亚研究中的主导话语,也不一定都能对美国的中亚政策产生影响。例如,“危险话语”对美国中亚政策的影响也仅仅是启发性和引导性的,很少能直接反映在美国的中亚政策上。因为“危险话语”要影响美国的中亚政策,还必须使决策者接受这种话语。整体而言,只有那些能向美国追求其战略目标提供启示的话语,才会得到美国决策者的关注和接受,进而影响其政策。而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有三个:一是遏制俄罗斯、伊朗、中国,尤其是俄罗斯;二是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或其所乐见的安全和价值体系中;三是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① 在美国追求上述三个方面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危险话语”发挥了较为直接的作用。正因如此,本文将集中讨论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的具体表现及其政治效应。

三 美国中亚研究中“危险话语”的具体体现

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具体而言,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在分析中亚问题时,主要采取了“殖民主义”与伊斯兰主义这两种分析范式,从而建构了一种中亚地区极具危险的意象。殖民主义范式主要用来理解苏联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伊斯兰主义范式则集中关注中亚国家可能对苏联在该地区的统治造成的伊斯兰威胁。^② 随着苏联解体,中亚得到了美国学术界、决策者和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苏联时期美国形成的中亚是一个存在诸多危险的地方这一意象,并未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至今依旧是美国形式话语、实践话语与大众话语的主导意象。不过,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同时期的美国中亚研究衍生“危险话语”的主要问题也发生过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相伴而行。^③

① 参见曾向红:《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载《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0-163页;Stephen J. Blank, *U. S. Military Engagement with Transcaucasia and Central Asia*, 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 Camberley: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June 2000, p. iii; Mazen Labban, “The Struggle for the Heartland: Hybrid Geopolitics in the Transcaspian,” *Geopolitics*, Vol. 14, No. 1, 2009, pp. 14-15。

② 参见 Will Myer, *Islam and Colonialism: Western Perspective on Sovie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William Fierman, ed., *Soviet Central Asia: The Failed Transformation*, Boulder: Westview, 1991; Alexandre Benignsen and Marie Broxup, *The Islamic Threat to the Soviet State*, London: Croom Helm, 1983。

③ 对西方关于中亚“危险话语”演变过程的讨论,也可参见 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 “Contesting Danger: 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pp. 591-594。

自1991年至今,美国的中亚政策大致经过五个发展阶段。^①1991-1994年是第一个阶段,美国主要关注哈萨克斯坦的核武器问题以及塔吉克斯坦内战,与此相对应,“危险话语”突出的是中亚地区核武器扩散和该地区的冲突风险。1995-2000年是第二个阶段,美国中亚政策集中关注里海能源及其输往国际市场的管线方案,“危险话语”主要围绕大国争夺里海能源管线而展开。2001-2004年是第三个阶段。受九一一事件的影响,美国在中亚主要着眼安全问题(尤其是恐怖主义问题),该阶段“危险话语”将重点放在了中亚地区遭受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带来的冲突的可能性上。2005-2008年是第四个阶段。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3月爆发“郁金香革命”与乌兹别克斯坦2005年5月发生“安集延事件”,导致美国中亚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中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及其民主化的前景上。但因为美国在应对“安集延事件”的过程中遭遇了战略挫折,导致“危险话语”对于中亚地区哪种问题构成最紧迫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部分学者转而强调中亚地区的冲突可能,另一部分学者继续关注中亚国家未能实现民主化带来的问题。这种分歧一直持续到奥巴马上台。2009年至今是美国中亚政策的第五个阶段。随着阿富汗形势的持续动荡以及奥巴马政府宣布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美国中亚研究界中的“危险话语”再次将焦点放在了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并再次强调早在2005年即开始提出的实现中亚与南亚地区一体化的必要性。

尽管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在不同时期对危险来源的判断发生过变化,但其建构的有关中亚是一个危险之处这一意象却始终未变。整体而言,根据美国的形式话语、实践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描述,中亚是一个问题重重、危机四伏的地方。这些危险不仅对中亚国家的“国家转型”提出了诸多挑战,而且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在“危险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塔吉克斯坦内战与费尔干纳盆地的冲突具有突出的影响。美国中亚学术界关于中亚地区的“危险话语”虽早在中亚国家独立前即已出现,但塔吉克斯坦1992年持续到1997年的内战激发了这种趋势。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塔内战是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伊斯兰信仰对苏联统治造成“威胁”的迟来的证据。此后,评估塔内战的场景是否会在其他中亚国家出现,成为美国中亚研究者一

^① 对美国中亚政策演变阶段的研究,可参见郑羽主编:《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1991-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4页;杨鸿玺:《美国中亚战略20年:螺旋式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147页;Matteo Fumagalli,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 in Emilian Kavalski, ed.,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Region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New Jersey and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0, p. 177。本文对美国中亚政策五个阶段的划分,在参考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

项常规性的工作。^①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另一个衍生了大量“危险话语”的议题,是对费尔干纳盆地爆发暴力冲突可能所做的评估。许多美国中亚研究者认为,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的“危机聚集地”或“冲突的燃点”。这种判断的形成,除了费尔干纳盆地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发生过冲突^②以及该地区存在引发冲突的一系列因素(如环境、宗教等)以外,90 年代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族群冲突同样对于中亚研究者产生了影响。费尔干纳盆地的复杂形势以及将费尔干纳盆地与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等地进行的类比,使许多中亚研究者在伊斯兰和政治暴力之间建立了联系,认为冲突可能会在经济落后和边缘性的费尔干纳盆地产生。^③ 然而事实表明,费尔干纳盆地并未发生预言中的严重冲突,该地区的形势远未达到“危险话语”所描述的危险程度。

除了塔吉克斯坦内战与费尔干纳盆地冲突造成的影响,中亚地区存在的其他问题也让“危险话语”认为该地区的前景不妙。随着“危险话语”的广泛传播,关于中亚地区是一个危险重重的地方的意象,逐渐内嵌在西方尤其是在英语国家的公共意识之中。基于这种判断,“危险话语”认为,中亚国家面临“阿富汗化”或“巴尔干化”的风险,^④而中亚各国已是或接近成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尴尬国家(awkward states)”或“虚弱国家(weak states)”。^⑤ 自 2001 年开始,关于塔吉克斯坦及其他中亚国家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失败国家”的论断,经常出现在各种政策报告和学术成果之中。^⑥ 这些概念的使用和对中亚形势的悲观判断,其主要针对的目标是美国国会与公众。通过夸大和渲染中亚地区存在的危险,美国政府可以要求国会和民众支持其对于中亚地区的介入,并支持美国增加对该地区的投入。

① Barnet R. Rubin, “Tajikistan: From Soviet Republic to Russian-Uzbek Protectorate,” in Michael Mandelbaum, ed.,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 Kazakhstan, Uzbekistan, Tajikistan, Kyrgyzstan, and Turkmenista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4, pp. 207–224.

② 1989 年,费尔干纳盆地发生暴力冲突,导致乌兹别克斯坦数个城市爆发了乌兹别克人和麦斯卡特突厥人(Meskhetian Turks)之间的冲突,相关情况参见 Christine Bichsel,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sia*, p. 19, p. 137. 关于 1990 年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地区爆发族群冲突的情况,可参见 Valery Tishkov, “‘Don’t Kill Me, I’m a Kyrgyz!’: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in the Osh Ethnic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2, No. 2, 1995, pp. 133–149; Abilabek Asankanov, “Ethnic Conflict in the Osh Region in Summer 1990: Reasons and Lessons,” in Kumar Rupesinghe and Valery Tishkov, eds., *Ethnicity and Power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ari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96.

③ Christine Bichsel,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sia*, p. 3.

④ Pauline Jones Luong, “The Middle Easternization of Central Asia,” *Current History*, Vol. 102, No. 666, 2003, p. 333.

⑤ Fiona Hill,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 Uzbekistan, Tajikistan, Afghanistan, Pakistan, and Iran,” The Aspen Institute Congressional Program, August 15, 2002,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speeches/2002/08/15russia-hill>. 登录时间:2013 年 11 月 14 日。

⑥ John Heathershaw, *Post-Conflict Tajikistan*, pp. 49–52, pp. 128–130.

美国学术界和决策者之所以认为中亚国家存在国家失败或“阿富汗化”的可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一是俄罗斯对中亚地区存在霸权或帝国雄心。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即使是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后,俄罗斯并未意识到其伟大的帝国时代已经结束,而是继续使用某些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话语。^①有学者甚至认为,俄罗斯的集权倾向与中亚国家的内部虚弱,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执行新帝国主义政策准备了条件。^②二是该地区各国领导人的继承机制不透明、各国存在严重的腐败和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可能导致它们已经走上了衰败之路。三是各国对伊斯兰信仰不宽容,可能带来极端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的壮大,导致各国爆发严重的国内冲突。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中亚各国在水资源分配、边界划定、争夺地区领导权方面存在的争端以及中亚各国面临的毒品、经济形势的恶化、转型期间面临的社会变迁等问题,都被视为威胁到中亚地区的稳定及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属于转型话语、大国竞争话语与援助话语的研究范畴。这里重点对“危险话语”在第二和第三个方面的体现进行讨论。

首先,中亚各国国家领导人继承机制的不透明,被“危险话语”视为可能导致中亚国家面临失败或“阿富汗化”的重要因素。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在位时期较长,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Islam Abduganiyevich Karimov)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年事已高,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过两次平民骚乱迫使总统下台并出逃的事件,因此,中亚国家如何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成为美国决策者及中亚研究者极为关注的问题。在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2006年12月逝世前后,美国中亚研究学界出现了一系列预言该地区领导权更迭会带来暴力冲突的成果。^③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土库曼斯坦面临的部族间紧张和大规模贫困,可能会导致国家动荡。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尤金·鲁默(Eugene B. Rumer)甚至断言,中亚国家的政治继承制只有两种前途:塔吉克

① Boris Rumer, *Central Asia: A Gathering Storm?* London: Sharp, 2002; Andrés Schipani-Adúriz, “Through an Orange-Colored Lens: Western Media, Constructed Imagery, and Color Revolutions,”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Vol. 15, No. 1, 2007, p. 94.

② Rajan Menon and Hendrik Spruyt, “The Limits of Neorealism: Understanding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1999, p. 96.

③ 那些警告中亚地区的领导人继承问题可能带来暴力的观点,参见 Eugene B. Rumer, “Central Asian Leadership Succession: When, Not If,” *Strategic Forum*, No. 203, 2003, pp. 1-6; Stephen J. Blank, “Strategic Surprise? Central Asia in 2006,”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 4, No. 2, 2006, pp. 109-130; Kathleen Collins,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97, p. 302; Stephen Blank,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entral Asia: An American View,” *Parameters: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Vol. 38, No. 1, 2008, p. 80.

斯坦内战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①然而,土库曼斯坦并未像一些美国学者所预测的那样发生大规模的动荡,更未带来中亚国家之间的冲突。这说明中亚各国的政权交接问题并不像美国中亚研究者和决策者担心的那样危机四伏。美国的中亚研究者却坚持认为,中亚各国领导人眷恋权力和随处可见的腐败以及经济发展滞缓,让各国面临“爆炸性的形势”,而且面临陷入“国内无政府状态”危险。^②

中亚各国的腐败形势和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学者和决策者有关中亚各国面临国家失败或“阿富汗化”危险的认知。在他们看来,各国民众在经济上面临的贫困状态,是极有可能激发政治动荡的因素。根据这种思路,中亚地区“冲突的风险被还原为资源的绝对缺乏”。^③在美国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中亚各国政府并不能向其公民提供人身安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公共物品,政府无能将给各国稳定与地区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国际危机组织每年发布的关于这两个国家的报告,明显地表现出西方的悲观判断。^④仅浏览标题,很容易让人产生吉、塔两国已经崩溃或处于崩溃边缘的印象。在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族群冲突之后,该组织对于中亚局势的判断更趋严峻,甚至认为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⑤问题不仅仅在于国际危机组织所发布的这些成果往往渲染中亚国家面临的诸多困难,更核心的问题是它们在美国的中亚研究界和政界流传甚广,这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学术界、决策者和普通公众对中亚形势的危险认知。

其次,中亚各国针对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恐怖分子所采取的政策,被美国决策者和学者认为过于依赖强制性措施,导致各国政府在违背了对人权和民主承诺的同时,反而促使这些势力进一步激进化。美国的中亚研究者和决策者认为,这是激发该地区普通教徒走向极端并采取恐怖活动的重要原因。例如,著名记者、阿富汗与中亚问题专家阿迈德·拉什德(Ahmed Rashid)就不断宣扬这种观点。他认为:“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兴起,意味着中亚各国政府过于极权和反民主的性质让反对派采取极端主义立

① Eugene Rumer, “The U.S. Interests and Role in Central Asia after K2,”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3, 2006, p. 151.

② Mikhail A. Alexseev, “Regionalism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 A Case of ‘Reversed Anarchy’,” *Donald W. Treadgold Papers*, No. 37, 2003, p. 12.

③ John Heathershaw, *Post-Conflict Tajikistan*, p. 162.

④ 国际危机组织所发布的中亚国家政治发展报告的全文,可参见 <http://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asia/central-asia.aspx>, 登录时间:2013年11月14日。

⑤ 阿博尔的预测,可参见 Louise Arbour, “Next Year’s Wars,” December 27,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2/27/next_years_wars? page=0,5, 登录时间:2013年11月14日; Louise Arbour, “10 Conflicts to Watch in 2013,” December 27, 2012,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12/27/10_conflicts_to_watch_in_2013? page=0,9, 登录时间:2013年11月14日。

场。如果中亚各国内部不发生迅速转型,那么爆炸性的暴动将吞没中亚,并使该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①“军事伊斯兰主义在中亚地区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在费尔干纳盆地,源自于中亚各国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以及禁止民主化并拒绝取消对政治活动的限制”。^② 美国的中亚研究者致力于在政府镇压与“军事伊斯兰主义”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认为各国针对恐怖分子和武装伊斯兰分子采取的措施,不过是各国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寻找的借口,而这种借口具有疏远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堵塞公民表达政治怨恨的效果。如果普通公民将怨恨转入地下,那将增强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组织或极端分子的吸引力。这些势力的壮大将对各国的世俗统治构成重大挑战。^③

在中亚五国中,美国决策者和研究者尤为关注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的镇压措施与暴力反叛之间的联系。有学者认为,“如果不加变革,乌兹别克斯坦这口大锅很可能会发生爆炸。包括伊斯兰团体在内的许多反对派,将利用民主价值观去动员绝望的公众”。^④ 基于这种判断,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2000年4月在塔什干世界经济和外交大学发表演讲时,警告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不要实行“不加区分的政府审查和压制,这可能导致一个温和与和平的反对力量诉诸暴力”。^⑤ 在中亚国家的应对措施与伊斯兰激进化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因果联系,具有明显的误导性,原因在于以下三点:第一,仅仅只有政治压制并不会导致激进主义,经济绝望、政治腐败、外部干预等因素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第二,民主与自由应有其限度,过分的自由也有可能滋生极端主义思想和运动,如新纳粹运动。^⑥ 第三,美国在对待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上持有双重标准。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可以以反恐为名对公民进行大规模秘密监视,而中亚国家采取的必要限制措施则被视为政治面临失败的证据。美国这种国内外有别的做法,被中亚国家认为不过是自私自利的举动。^⑦

总体而言,美国的中亚学者和决策者集中关注的仍是促使中亚各国推进民主和自

① Ahmed Rashid, “The New Struggle in Central Asia: A Primer for Baffled,”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7, No. 4, 2000–2001, p. 34.

② Ahmed Rashid, “The Fires of Faith in Central Asia,”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8, No. 1, 2001, p. 55.

③ Shahram Akbarzadeh, “U.S.-Uzbek Partnership and Democratic Reform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2, No. 2, 2004, p. 283.

④ Vitaly Naumkin, “Uzbekistan’s State-Building Fatigu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3, 2006, p. 139.

⑤ Shahram Akbarzadeh, “U.S.-Uzbek Partnership and Democratic Reforms,” p. 284.

⑥ Rein Müllerson, *Central Asia: 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60.

⑦ 也可参见 Martha Brill Olcott, “The Shrinking US Footprint in Central Asia,” *Current History*, Vol. 106, No. 702, 2007, p. 339.

由化改革,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中亚地区没有改革和变化,反恐战争中的短期伙伴将成为长期敌人”。^①换言之,在批评中亚国家的发展道路及其打击恐怖分子采取的措施时,美国的中亚研究者及决策者采取的不是一种“同情式”的理解,而是基于西方的规范标准进行判断。由此导致他们对中亚国家的发展动力产生了严重的偏见,或者有意建构出扭曲的意象。这种意象也许学术价值不高,然而意义却十分重大:它们为美国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紧迫的理由,而且为美国介入中亚赋予了道德上的优势。

四 美国中亚研究中“危险话语”的政治效应

尽管“危险话语”建构中亚地区危险意象的过程和论证比较粗糙,往往以简化了的假定作为自身的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具有明显和重大的政治效应。例如,“危险话语”不但塑造了美国关于中亚地区的形式话语、实践话语和大众话语,而且还引导着西方从发展援助和商业联系到选举观察、再到安全和学术援助等在内的诸多政策活动。而这些援助的低效及活动的受阻,经由“危险话语”的解读,反过来衍生出更多的“危险话语”。也就是说,作为象征体系的“危险话语”,已经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并进行自我循环,从而构建了一种关于中亚形势的主体间环境。^②当形式话语、实践话语与大众话语不断重复“危险话语”时,“危险话语”构建的关于中亚地区的意象就成为美国决策者下意识接受的观念,并成为美国制定其中亚政策的依据。^③就此而言,“危险话语”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美国针对中亚地区行使呈现性权力的过程。其中,“危险话语”最为重要的政治效应,是基于中亚地区危险重重的意象,为美国的中亚政策赋予了正当性、合法性以及相对于其他大国的良好道德形象,甚至为美国的中亚政策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危险话语”虽然可以影响美国的中亚政策,但话语与政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活动领域,从话语到政策的转化,还需要一些机制来完成。通过回顾二十多年来美国中亚政策与美国中亚研究之间的互动过程,我们可以勾勒出中亚研究话语影响美国中亚政策的三种具体机制。第一种是“旋转门”机制,即一些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与政府官

① Eugene Ru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 In Search of a Strategy,” in Eugene Rumer, Dmitri Trenin and Huasheng Zhao,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New York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7, p. 50.

② 丽莎·韦登对象征性及其呈现逻辑做出了较好的分析,参见 Lisa Wedeen,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Syr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通过借鉴韦登的代表作对中亚的象征政治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参见 Sally N. Cummings, ed., *Symbolism and Power in Central Asia: Politics of the Spectacul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③ John Heathershaw, “Tajikistan’s Virtual Politics of Peac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1, No. 7, 2009, p. 1318.

员身份之间相互转化。典型例子是2006—2009年间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亚与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方艾文虽然主要是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而知名,但他研究亚洲问题的学术背景与在美国国务院的任职经历显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关性。第二种是知名学者通过自身的学术论著、提交政策咨询报告、在美国国会作证等方式对美国中亚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玛莎·奥尔科特(Martha B. Olcott)、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所的史蒂芬·布兰克(Stephen J. Blank)、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吉姆·尼科尔(Jim Nichol)等知名的中亚研究专家。第三种机制是美国中亚研究界关于中亚问题的学术争论,促使美国决策者对其中亚政策进行调整。例如,2005年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中遭遇战略挫折后,中亚学术界就美国在该地区应优先关注处理安全问题还是继续强调推进民主展开了大量的争论。或许是对此做出回应,时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于2005年12月11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和平论的承诺》的文章,强调了美国不会放弃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的立场。^①事实上,受美国学术界的影响,2005年以来美国在中亚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比较温和。

在美国追求的三重战略目标方面,“危险话语”产生了最为明显的政治效应。“危险话语”对中亚地区发展形势的悲观判断以及对危险来源的诊断,促使美国将主要资源投入到“危险话语”最为关注的领域,以实现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战略目标。如前所述,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主要围绕俄罗斯针对中亚地区的大国雄心、中亚国家可能走上衰败之路、中亚地区尤其是费尔干纳盆地可能爆发冲突等问题展开。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危险话语”在引导美国决策者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应对方面的作用比较明显。具体而言,“危险话语”不仅推动美国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俄罗斯恢复对中亚的统治、促进中亚与南亚之间的地区一体化、通过提供各类援助消除中亚地区的冲突可能,而且还为这些行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受到“危险话语”影响的政策,又对“危险话语”的再生产生影响,从而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彼此影响的关系。下文分别对“危险话语”在促使美国采取行动追求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方面产生的政治效应进行简要讨论。

首先,“危险话语”为美国采取行动遏制俄罗斯、伊朗、中国赋予了正当性和必要性。尽管美国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是自苏联解体以来就在执行的一项政策,但“危险话语”为美国遏制俄罗斯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俄罗斯统治中亚地区长达一百多年,而美

^① Condoleezza Rice, “The Promise of Democratic Peac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1, 2005, B7.

国迟至苏联解体之后才进入该地区。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美国影响力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俄罗斯影响力的削弱。这并非零和思维,而是因为美国与俄罗斯在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都采取一种排他的方式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双方均认为,对方地位的上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自身地位的下降。不过,对于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中亚国家并不像俄罗斯一样持警惕和抵制态度。至少在“颜色革命”之前,中亚国家整体而言是欢迎美国介入该地区事务的。在“危险话语”中,充斥着有关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外部行为体试图以中亚国家的主权为代价获取自身利益的观点。在“危险话语”看来,俄罗斯、伊朗、中国等国在中亚为维护自身利益所采取的行动是削弱美国影响力的行为;中亚国家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则被视为弱小的中亚国家受到大国胁迫的结果;其他大国支持中亚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的表态,则被视为这些大国阻碍美国在中亚推进民主以及维护中亚“独裁政权”的举动。诸如此类的解读,让美国的中亚研究者和决策者坚信,遏制俄罗斯、伊朗、中国等国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危险话语”尤其认为,俄罗斯对中亚地区具有的帝国野心以及在该地区以零和方式追求自身利益,构成阻碍中亚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自主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障碍,也是美国认为需要加以阻止的一种危险。

“危险话语”还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建构了一种仁慈霸权的形象。在美国的中亚研究者和决策者看来,“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干预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受邀请的、有益的和慷慨的”。^① 这种关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积极形象弥漫于美国的学术研究和大众媒体之中。美国学者讨论“新大博弈”时,往往强调美国是因为受到俄罗斯与中国的牵制而不得不采取行动以维护自身利益。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中亚事务后,美国逐渐“形成一种尝试在该地区‘击退(roll back)’俄罗斯影响力的雄心勃勃的战略,代之以一个新的、更为仁慈的美国霸权”。^② 有关美国构成一个仁慈霸权的观点在冷战后层出不穷,它们为美国以侵略性的手段追求霸权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危险话语”和美国决策者不会认为美国是秉持零和思维参与中亚事务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中亚和高加索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于1997年7月21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演讲,是这种观点最为典型的反映。^③ 不仅学术界和政界坚信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良好意愿和仁慈慷慨,媒体与影视界同样宣扬美国介入中亚的道德

① Anthony R. Bichel, *Contending Theories of Central Asia: The Virtual Reality of Realism, Critical IR and The Internet*, Ph. D. Dissertatio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7, p. 106.

② Anatol Lieven, “The (Not So) Great Gam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49, 1999–2000, p. 70.

③ 塔尔博特于1997年7月21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参见 Strobe Talbott, “A Farewell to Flashman: American Policy i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8, No. 6, 1997, p. 10.

优越性。^① 在“危险话语”的支持和论证下,美国在中亚追求遏制俄罗斯等国的各种政策和行动被认为是崇高的,因为这是帮助中亚国家维护它们主权和独立的善意举动。

其次,“危险话语”还具有推卸美国造成加剧中亚地区“危险”程度的责任并促使美国采取直接行动整合中亚国家的效应。对于前一个方面的效应,“危险话语”在指出美国开展的“持久自由行动”给中亚国家带来了各种问题的同时,渲染了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认为因为阿富汗局势的动荡,中亚国家在国家建构中面临老问题加剧和新问题产生的严峻形势,中亚地区的危险程度加剧。不可否认,“危险话语”指出的一些问题——毒品泛滥、大国竞相扩大在中亚的影响、边界地区武装势力猖獗等——的确存在,但“危险话语”在诊断这些问题的根源时持有偏见。例如,中亚毒品走私、边界地区武装势力猖獗等问题在美国开展“持久自由行动”之后虽有所加剧,但这并非中亚国家内部发展导致的,而是美国的侵略行动以及未能稳定阿富汗局势带来的结果。然而,通过指出这些问题源自中亚各国政府无能和应对不力,“危险话语”回避了对美国的批评。基于这种认知,中亚国家被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认为是从中东延伸到东北亚的“动荡之弧”区域的一部分。^② 当“危险话语”回避讨论美国入侵阿富汗给中亚国家带来的困难,并将该地区“危险”程度加剧的原因归咎为中亚国家时,它也就推卸了美国应为这种“危险”加剧所应承担的责任。

对于后一个方面的效应,“危险话语”针对中亚地区的危险而开列的处方之一,即要求美国推进中亚与南亚地区一体化,以此促进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自2005年以来,美国提出了“大中亚计划”,尝试推进南亚与中亚地区的一体化;^③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则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其核心仍是以阿富汗为中心整合中亚与南亚地区。^④ 然而,这些倡议不过是美国决策者借助“危险话语”,为稳定阿富汗局势和美国在中亚追求的整合中亚国家这一战略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将南亚和中亚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更多的是美军攻打阿富汗以及随后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

① 例如,美国系列电视连续剧《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对美国介入中亚地区形象的描述以及好莱坞电影《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所塑造的孤身反击来自中亚恐怖分子的总统形象。可分别参见 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 “Contesting Danger: 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pp. 597–598; Anthony R. Bichel, *Contending Theories of Central Asia*, pp. 181–182。

② 拉姆斯菲尔德在2002年向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中东延伸到东北亚的广袤地区存在着一条动荡之弧,这一地带是由许多正在崛起或正在衰落的地区大国构成的脆弱复合体。”中亚国家处于这条“动荡之弧”的范围内。转引自 Ilan Berman, “The New Battleground: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 1, 2004, p. 62。

③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杜幼康:《美国的南亚与中亚“整合”战略剖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第16–21页。

④ 赵华胜:《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探析》,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5–24页。

斯坦建立军事基地的后果,而不是这两个地区民众彼此认同及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此外,既然在“危险话语”看来,中亚地区面临“阿富汗化”或“巴尔干化”的危险、中亚国家有沦为“失败国家”、“尴尬国家”的可能,为何美国一定要以阿富汗为中心整合中亚与南亚国家呢?除了希望将中亚与南亚国家捆绑在一起、借助这些国家的帮助将阿富汗拖出泥沼之外,美国的真实目标还在于以对美国有利的方式促进中亚与其周边地区的整合,通过促使中亚国家发展与其南部邻居的关系,削弱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传统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美国致力于“将中亚与其南部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并不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一个自然和令人期待的过程。相反,这是西方的一种社会构建,主要通过政治话语和行动而形成,随后又影响到美国的战略立场和针对该地区的政策”。^① 中亚与南亚地区在历史与现实方面存在的众多差异以及阿富汗局势的持续动荡,决定了中亚与南亚地区之间的一体化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

最后,“危险话语”还影响了美国对中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塑造。为了消除中亚地区冲突的可能,“危险话语”首先建构了一种有关中亚国家发展前景只能在危险与希望之中二选一的两分法,然后基于此推动美国通过提供民主、安全等援助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危险话语”认为,中亚国家的转型进程充满风险,只有两种相互排斥的选择:一种选择是中亚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国家能够恰当并且充分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但能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运行,而且能有效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另一种选择是中亚各国无法履行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职责,内部纷乱不断,导致各国不仅面临国家崩溃或国家失败的风险,而且有损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② 为了消除中亚地区存在的“危险”,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决策者自然希望中亚国家走上具有“希望”的道路,即西方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这种思维逻辑不仅赋予了美国在中亚地区一种类似于救世主的角色,而且为美国在“善治”、“民主”与“人权”等口号下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提供了理由。

基于上述判断,“危险话语”还明确建议美国通过提供各类援助以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尽管根据“转型学”的基本假定,美国的中亚研究者和决策者从一开始即已预设中亚国家终将会走向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然而,“西方学术界仍然存在一种恐惧,认为中亚国家可能随时被内战、核扩散、激进伊斯兰运动、生态灾难、经济崩溃、俄罗斯帝国雄心的复活等危险所吞没”。^③ 基于这种恐惧,“危险话语”认为,通过向中亚各国提供

① John Heathershaw and Nick Megoran, “Contesting Danger: A New Agenda for Policy and Scholarship on Central Asia,” p. 601.

② 这种两分法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运用,参见 Valentine Borisovich Bogatyrev, “The Central Asia Transition: Threats to Security,” *Helsinki Monitor*, 2003, No. 3, p. 282.

③ Graham Fuller, “Central Asia: The Quest for Identity,” *Current History*, Vol. 3, No. 582, 1994, p. 149.

民主和安全援助,可以避免中亚国家被各种危险所吞没。为此,“危险话语”认为向中亚国家提供各类援助具有必要性,并坚持认为舍此中亚国家将难以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中亚问题专家菲奥纳·希尔 2002 年 9 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促进合作而不是冲突,取决于美国、其他关键援助者、国际组织的政治立场以及它们协调向该地区各国提供援助的能力,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各国及其政府进行国内改革和发展的能力。”^①美国决策者与希尔一样,对美国介入中亚地区的这种使命直言不讳。例如,在 1999 年 9 月向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美国负责向新独立国家提供援助的协调员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强烈支持美国介入中亚地区。他指出,开展资助各种交流项目、发展医院和大学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各种信息中心和获得美国信息署的互联网服务以及支持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项目等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是‘推进民主、公民社会、创造就业、培育中产阶级和确保欧亚地区稳定的最佳途径’”。^②

总之,“危险话语”与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具有比较直接的关系。无论是遏制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还是促使美国采取行动整合中亚与南亚国家,抑或通过提供各类援助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危险话语”不仅为美国的行动提供了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论证,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危险话语”在对美国中亚政策发挥引导和启示作用的过程中,掩盖了其针对中亚地区及各国所实施的呈现性权力。这也说明,在运用呈现性权力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美国的研究者和决策者在判断中亚国家的国家地位和发展态势时,具有唯一的参考标准,即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而与西方国家有异或者无法达到西方标准的国家,则是不负责任的政府或“失败国家”。基于这种规范标准诠释和呈现中亚国家的目标,旨在让作为“自我”的西方国家去改造或拯救作为“他者”的中亚国家。既然“他者”是“失败的”、“虚弱的”、“尴尬的”,那么作为西方的“自我”就有必要进行干预,以将它们拯救出来。在这种思维过程中,中亚国家是否具有自身的发展动力和自身的规范标准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美国的中亚研究者和决策者认为美国具有塑造中亚国家发展方向的义务和责任。

五 结论

本文旨在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美国中亚研究为什么“危险话语”盛行?这种

① Richard Giragosian, “The US Military Engagemen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Southern Caucasus: An Overview,”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17, No. 1, 2004, p. 75.

② Andrew M. Essig, *Managing Instability: America's Pursuit of An “Expansion” Policy in the Capian Sea Region*, Ph. D. Dissertation, Philadelph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1, p. 40.

话语针对中亚地区构建了什么样的意象?这些意象又对美国的中亚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通过将“危险话语”纳入到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本文指出了“危险话语”与美国针对中亚国家施加呈现性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为美国中亚研究中的一种主导话语,“危险话语”虽然是以对于中亚形势进行片面或扭曲的呈现为特征,但产生了明显的政策影响。它们建构并维持着美国决策者、学者与大众针对中亚地区的一种极富危险的意象,进而影响到美国中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尽管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自冷战结束以来经历过变化,而且与美国中亚政策的演变阶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衍生“危险话语”的议题集中在以下问题上,如俄罗斯对中亚地区存在霸权或帝国雄心、该地区因各种原因面临的国家衰败、地区各国面临的冲突可能等问题。至于“危险话语”对美国中亚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启发美国采取行动遏制俄罗斯、整合中亚与南亚国家、提供各类援助塑造中亚国家发展方向等方面,这些方面密切涉及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

美国通过中亚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向中亚国家行使呈现性权力,面临来自中亚国家的抵制。美国所拥有的呈现性权力,建立在相对于中亚国家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专业知识、信息平台等的基础上。整体而言,“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大多数新独立国之间的关系以西方占优的权力不对称为特征”。^①这种权力不对称体现在美国拥有的呈现性权力资源上,这些资源既包括西方规模不小的中亚研究群体以及众多的发表中亚问题论著的平台——期刊与出版社,也包括美国国内能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大众媒体。而中亚国家并不具有可以与美国一较高下的平台和媒体。美国通过运用其掌握的呈现性权力资源,可以将“危险话语”广泛加以传播,甚至塑造世界各国包括中亚国家民众对于中亚地区的认知。毫无疑问,对于美国基于其呈现性权力优势建构的关于中亚地区的扭曲意象,中亚国家偶尔也会通过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资源进行反击,尤其是在某些攸关国家身份或国际形象的重大问题上。例如,针对由美国导演拉里·查尔斯(Larry Charles)执导、英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萨沙·科恩(Sacha B. Cohen)主演的电影《波拉特》,^②哈萨克斯坦就从国家层面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形象保卫战,以捍卫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文明和现代化国家的国家身份。然而,由

① Michael J. Tierney, *Commitments, Cred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into Western Multilateral Regime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p. 7.

② 该片塑造了一个名叫波拉特的哈萨克斯坦人,在考察美国的过程中对美国文化的观察与反思。尽管该片在西方国家广受赞誉,但影片中塑造出来的波拉特的形象是以无知、粗鄙为特征的。这正是哈萨克斯坦对该片非常敏感的原因。

于与好莱坞所拥有的呈现性权力资源不可同日而语,哈萨克斯坦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①这一例子比较突出地说明了中亚国家呈现性权力的不足以及不得不向美国呈现性权力做出妥协的无奈。^②然而,如果美国不对其在中亚国家运用呈现性权力造成的负面后果——尤其是中亚国家精英和民众对此的反感和怨恨——有所反思,那么基于扭曲了的主导话语制定的中亚政策,将导致美国很难顺利推进其在该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

基于“危险话语”制定的美国中亚政策,虽然具备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但其带来的后果却不一定全是积极的。^③不能否认,中亚国家的内外部形势仍面临许多挑战,但是通过外部干预应对这些挑战,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对于中亚地区存在的某些问题,美国中亚学者的“诊断”可能是对的,但他们开列的政策建议则存在局限性,有的根本不对症。当然,美国的一些中亚研究成果也有可取之处,比如能够利用多方面的资源(有些研究项目还尽量吸纳来自中亚地区学者的参与)、注重实地跟踪调研、注意利用科学研究方法等。总之,中亚局势充满变数,美国的中亚政策也会不断调整,政界、学术界、公众也会中亚局势持续关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也会持续发挥作用,它会如何变化、会对美国中亚政策产生什么影响,是我们应该持续关注并予以研究的课题。

[收稿日期:2013-10-25]

[修回日期:2013-12-16]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美国民众对于哈萨克斯坦开展的公共外交所做的反应,可参见 Jami Fullerton, “Alice Kendrick, Courtney Wallis, Brand Borat? Americans’ Reaction to a Kazakhstani Place Branding Campaign,”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Vol. 4, No. 2, 2008, pp. 159-168.

② 关于哈萨克斯坦对于电影《波拉特》所做的回应以及在此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可参见 Edward Schatz, “Transnational Image Making and Soft Authoritarian Kazakhstan,” *Slavic Review*, Vol. 67, No. 1, 2008, pp. 50-62; Robert A. Saunders, “Buying into Brand Borat: Kazakhstan’s Cautious Embrace of Its Unwanted ‘Son’,” *Slavic Review*, Vol. 67, No. 1, 2008, pp. 63-80; Paula A. Michaels, “If the Subaltern Speaks in the Woods and Nobody’s Listening, Does He Make a Sound?” *Slavic Review*, Vol. 67, No. 1, 2008, pp. 81-83; Robert A. Saunders, “In Defence of Kazakhshilik: Kazakhstan’s War on Sacha Baron Cohen,”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Vol. 14, No. 3, 2007, pp. 225-255.

③ 举例来说,吉尔吉斯斯坦之所以在2005年和2010年两次发生政治动荡,部分原因就在于吉在未完成国家建构的情况下迅速实行民主化。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美国才在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和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族群冲突后,不断降低在中亚推进民主的力度,并将维护该地区的安全重新调整为美国中亚政策追求的首要目标。由此可见,“危险话语”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建议,并不一定有利于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各国的政治发展。